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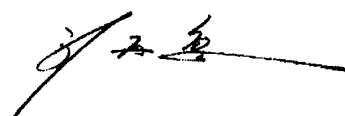
們對這種立場極為真誠，篤信不疑，他們的聲音當然值得傾聽。或許文化批判理論的非普適性，現在果真到了結束之時。對此，我盼望能讀到更有說服力的論證。

不過目前的情況，使我想起中國最偉大的留學生，唐初的玄奘。玄奘在印度學佛理，成績如此優異：在印度佛教的最高學術會議，曲女城的辯論大會上任論主，獲得「大乘天」至譽，回到長安後創立的法相唯識宗，是中國佛教史上最艱深，最「前沿」的宗派（佛教不久後就在印度開始式微），卻因搬用印度的種性論，而難以承傳。

這個故事未免太陳舊，道理也太淺。我只是想說，哪怕能自稱「何國人」的高僧，也不可能真正無家無國。

趙毅衡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博士，現執教於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。

可畏而不可信的學術年代



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生態環境相當惡劣，尤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，激進政治更是帶給學術以致命的危害。但是，我們現在則不幸地看到，帶給學術生態環境以污染和破壞的，不僅來自激進的、缺乏人文眼光的權勢者，而且也來自心胸狹窄的知識份子本身病態的作風與心態。面對這種局面，我格外欣賞傑弗遜所說的一句話：「我從不因為宗教上、政治上、文化上的分歧而拋棄任何一位朋友。」

十年前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刊之初，方正兄飛往芝加哥大學籌劃，其風塵僕僕之狀，至今印象猶新。當時歐梵、甘陽二兄和我皆是熱心人，毫無保留地支

持。到了海外，才知道學術論文幾乎無處發表，僅此一項，就足以悶死。因此，一聽說中文大學有心建設一個以人文科學為主的學術刊物，便如聞福音。記得當時還討論過刊物的名字，我有點悲觀，便開玩笑地說，可叫做《世紀末論壇》。因為我又知道，在商業社會中，學術刊物全是孤島，財少氣弱，能有世紀末期的十年壽命就不錯。沒想到，《二十一世紀》果真苦撐到二十一世紀，名副其實，單憑這一點，就值得慶賀了。



《二十一世紀》創建初期，我的態度比較積極，近幾年則有點疏遠。主要原因是對90年代故國學術狀況有點失望與害怕。這不是說，90年代沒有好的學術成果產生。好著作還是有，如季羨林先生的《文化交流的軌迹：中華蔗糖史》，楊寬先生的《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》等等，都是學術上品。我之所以失望，是看到太多文章表現出下列幾種不健康的狀態，這些狀態不僅使學術界變得可畏而不可信，而且使我倦於閱讀。

第一，學術姿態大於學問。無論是熱衷於「國學」還是熱衷於「西學」，許多文章「玩」的主要是學術概念、學術語言、學術姿態，為了表現出學問的所謂「功底」，便刻意引經據典，刻意轉述各種時髦的主義、後主義，這不僅使文章顯得過於冗長龐雜，而且形成一種很厚的覆蓋層。覆蓋層之表是華麗，覆蓋層之裏是蒼白。雖是洋洋萬言，縱橫恣肆，但立論並不清楚，作者要說些甚麼也沒想清楚。80年代的學術文章沒有覆蓋層，倒有真問題；90年代的學術文章有覆蓋層，卻少有真問題。這是因為真問題被語言和姿態所遮蔽，作者在自造的概念包圍中迷失。

第二，世故大於學問。世故是與天真、誠實對立的一個概念。所謂世故，表現在學術上便是寫文章均從利害關係出發，而不是從真理之愛出發。80年代的學術，有些地方雖然幼稚，但畢竟有天真在，有生命真實的脈搏在；而90年代的許多學術文章，包括許多年輕學人所作的文章，反而世故味很重，尤其是一些反省80年代的文章。80年代的反省，是對極權的批判與反叛，這是反叛者之音；而90年代的反省，則是反叛反叛者。這種反叛作為另一種質，是媚上與媚俗。一有世故之念，就不敢觸及社會現實的根本與理論的根本，「經世之學」方面的學術就不可能有實質上的發展（在中國處於社會轉型的大變動時期，逃避現實根本的「經世之學」一定會失去靈魂的活力）。由於世故，也往往急功近利，所以學術的另一方面——獨立精神架構方面，也看不到突出的成就。

第三，暴力大於學問。這裏指的是語言暴力。許多文章名為學術，但留給人的印象最深的則是語言的攻擊性與爆破性。這類文章沒有認真地進入學術問題，倒是在學術問題之外下了許多功夫。這些功夫包括抹黑性的命名，包括揭露阿Q瘡疤的策略，包括暗示對方乃是官方別動隊或帝國主義別動隊等等。更為嚴重的是乾脆使用三十年前的紅衛兵邏輯和造反派語言，用一句話或一個偶然事實爆破一個學者一生的卓越建樹(如對錢穆先生的爆破)。關於語言暴力進入文學、進入政治、進入學術的問題，我在今年七月維也納「展望二十一世紀中國」的學術會上，通過〈告別語言暴力〉的發言作了揭示。語言暴力是「五四」白話文運動的負面產物，後來經過數十年的文學、文化革命運動的發酵，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。如果對語言暴力不作認真的批評與遏制，那麼，學術文化界從今後將不得安寧，整個中國的學術生態環境將會惡劣到難以設想的地步。在《二十一世紀》創辦十周年之際，我要再次呼籲學術界的朋友放棄語言暴力和抵制語言暴力。

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生態環境相當惡劣，無論是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，均無一張平靜的書桌。戰爭時期受到炸彈的震盪，和平時期則經受政治運動的震盪。尤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，激進政治更是帶給學術以致命的危害。但是，我們現在則不幸地看到，帶給學術生態環境以污染和破壞的，不僅來自激進的、缺乏人文眼光的權勢者，而且也來自心胸狹窄的知識份子本身病態的作風與心態。後者的兩種心態一直使我害怕：一是年長者的帝王心態；一是年輕者的農民起義者心態。兩者都是自我感覺太好，都缺少平常之心。具有帝王心態的人，只知讓別人膜拜、頌揚、服務，不知尊重他人與提攜他人，誤認為自己的幾部著作真有雄鎮乾坤之力。具有農民起義者心態的人，則一味想走造反捷徑，一味幻想通過幾番「爆破」而翻身解放，雞毛上天。面對這兩種心態，我格外緬懷蔡元培和胡適的作風，他們是改革者，而且成就卓著，但始終虛懷若谷，遠離帝王趣味與造反派趣味。

近幾年，關於中國的未來走向，知識界的看法很不一樣。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正在呈現為不同的學術方向，不爭論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爭論中守住學術上應有的心靈原則與尊重對方的原則，維護學術尊嚴與學術紀律，則是共同的責任。意識形態的分歧，也不一定要導致知識界的分裂。我非常欣賞美國的思想先驅者傑弗遜(Thomas Jefferson)所說的一句話：「我從不因為宗教上、政治上、文化上的分歧而拋棄任何一位朋友。」創造一種爭論的朋友狀態而非敵我狀態，拒絕語言暴力進入刊物，這應是《二十一世紀》雜誌的光榮使命。作為一個編委，表達這點期望，也許不算非份。